

基于大数据微观模拟的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评估*

郑梦泽¹ 万相昱^{2,3} 赵大伟^{4**}

- (1. 东北财经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 辽宁 大连 116025;
2. 中国社会科学院 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 北京 100732;
3.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北京 102488;
4. 吉林大学, 吉林 长春 130012)

摘要: 本文基于全国企业汇算清缴大数据及现行企业所得税税制结构和课征办法, 建立能够精准追踪企业所得税具体政策措施对企业属性及行为反应微观归宿的微观模拟模型, 并且应用模型对我国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的执行效果进行研究。研究表明, 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可以显著改善企业经济状况, 为优化我国经济结构和稳定社会发展提供了助力, 对促进我国企业发展、拉动经济增长、稳定社会就业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实际作用效果与政策目标基本吻合。未来需要通过持续深化企业所得税改革、适度引导企业的税收政策行为反应等途径, 进一步强化企业所得税改革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

关键词: 企业所得税 减税降费 微观模拟 税收归宿 大数据

中图分类号: F224.0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16699/b.cnki.jqe.2024.01.005

* [基金项目] 本文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宏观大数据建模和预测研究”(71991475)、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人文社科类重大项目培育专项“公共政策的分配效应归宿分析与集成化微观模拟模型的研制”(02011903822004)、国家税务总局吉林省税务局重点课题“数字经济时代网络直播行业税收监管研究”(2201012003002)的联合资助。

** [作者简介] 郑梦泽(1976-), 男, 东北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行政管理、数字治理。万相昱(1978-), 男, 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 博士研究生导师, 研究方向为微观模拟、数字治理。赵大伟(1980-), 吉林大学法学博士, 研究员, 研究方向为民商法学。

Research on the Evaluation of Enterprise Income Tax Preferential Policies Based on Big Data Micro Simulation

Zheng Mengze¹ Wan Xiangyu^{2,3} Zhao Dawei⁴

- (1.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Dongbe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Dalian 116025, China;
2. Institute of Quantitative & Technical Economic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32, China;
3.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2488, China;
4.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12,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big data of national enterprise settlement and payment, as well as the current structure and taxation methods of enterprise income tax, this article establishes a micro simulation model that can accurately track the micro incidence of specific policy measures of enterprise income tax on enterprise attributes and behavior responses. The model is applied to study the implementation effect of China's enterprise income tax preferential policies. The research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enterprise income tax preferential policy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economic situation of enterprises, provide assistance for optimizing China's economic structure and stabilizing social development, and play a positive role in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enterprises, driving economic growth, and stabilizing social employment in China. The actual effect is basically consistent with the policy objectives. In the future, it is necessary to further strengthen the promoting effect of enterprise income tax reform on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through continuous deepening of enterprise income tax reform, moderate guidance of enterprise tax policy responses, and other means.

Keywords: Enterprise Income Tax Reduce Taxes and Fees Micro Simulation Tax Incidence Big Data

引 言

自 2018 年全球经济危机以来, 全球经济经历了艰难曲折的复苏进程, 各主要经济体的经济增长核心动力仍然不足。以减税为核心的经济政策在世界主要经济体开始强

化实施,进而全球范围内的更多国家开启规模税收政策调整序幕。例如,美国2018年提出了30余年以来最大规模的减税法案,使企业所得税率由原来的35%直接降为21%,为各国投资者提供了诸多税收优惠。日本、德国、英国、法国等国家也相继出台多项税收政策,力图通过降税政策促进本国经济增长。2019年以来,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和税收国际竞争加剧的背景下,我国也推出了大规模的减税降费政策,多项针对小微企业的普惠性减税政策以及一系列税收结构性改革措施相继出台。我国的减税降费政策对企业发展、劳动就业、居民消费以及经济增长等是否具有显著的积极促进作用;税收改革措施究竟能够对哪些群体、在哪些方面产生多大程度的影响;下一步该如何继续推进,在哪些方面还需要修改完善等一系列问题引起学术界和政策部门的广泛关注。

1 文献综述

国内的企业所得税研究更多侧重于利用静态分析方法,分析与评估税制改革的经济效应(王道树,2007;刘磊等,2010;叶显等,2019),近年来关于税收模拟的研究开始出现(朱启荣等,2018;张岩,2019;罗红云等,2023)。总体来看,传统研究在税收制度与政策设计的理论定性、结构分析和对策建议等方面取得了有益成果,但是传统研究的局限来源于缺乏理解复杂适应系统(CAS)的建模能力(郭雷等,2004)。经济是一个典型的CAS,特别地,当把“宏观政策对微观个体的经济影响”作为研究对象时,这一特征尤为显著。利用静态的、代表个体的、无行为反应、非系统建模的研究方法可能存在某些偏误。对异质化个体建立精准评价模型必须考虑微观因素,而传统经济模型均采用典型个体分析模式或总量分析模式,摒弃了经济归属,模型精确性不足。同时,传统模型往往采用单一视角,假设经济主体的行为是自身属性、经济环境和历史因素的函数映射,但是单纯的“归纳”分析无法提供经济主体应对变化、适应环境的决策机制,因此异质化的“演绎”必须被纳入研究范畴(万相昱和蔡跃洲,2019)。

微观模拟^①(micro simulation)技术为上述难题提供了有效解决办法(Orcutt,1957;Gupta and Kapur,2000)。它尝试突破传统研究方法的局限,以微观数据为基础,通过计算机来模拟个体的经济行为以及相互作用,从而可以主动观察或模拟政策效应,尤其是它可以在政策还没有实施前就实现对政策的实验模拟。目前,微观模拟模型在税收政策评价方面的运用取得了显著成果(Devereux and Loretz,2008;Finke et al.,2013;Caiumi and Biagio,2015)。其中,ISTAT-MATIS是企业微观模拟模型实证应用的典型案例,该模型根据财政规则模拟公司的税收与负债,意大利国家统计局定期将它

^① 微观模拟以具有代表性的微观调查数据为对象,应用计算机技术将已实施或未实施的政策(用于政策评价和政策设计)按照规则施加于微观个体之上,进而通过计算机模拟个体以及相应宏观总体的经济特征、经济行为以及相互作用来实现对政策的实验分析,而实验者最终可以自主提取有效的政策效应数据(无论是微观还是宏观)。

用于收入预测和政策分析。尽管如此,由于自由市场意识倾向于反对政府干预企业的行为或做出可能影响市场机制的规划设计,以及缺乏必要的微观数据等因素,微观模拟模型在企业所得税分析中的运用还需要进一步强化。微观模拟模型在我国的政策评估中快速发展。郭绍禧(1986)、李善同(1990)等学者对微观模拟模型的基本原理、应用领域等进行了系统阐述。万相昱(2009, 2011)、万相昱和唐亮(2017)、万相昱等(2021)将微观模拟模型在劳动力供给、所得税制度、个人所得税等研究领域进行推广应用。然而,目前还鲜有研究涉及微观模拟模型在企业所得税领域的应用。

公共政策的科学性与精准性的不断增强,越来越要求政策研究能量化到个体层面,而微观模拟技术可以实现将公共政策效应呈现至微观层面。微观模拟模型本质上不依托于外生假设,它是将总体按照规则施加于微观个体之上,进而通过计算机模拟个体的经济行为以及相互作用,从而得到最终实际上的政策效应。微观模拟模型具有较强的微观主体异质分析功效和宏观政策效应分析有效性。微观模拟模型可以实现对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大现实问题迅速展开事前模拟和事后评价,并将政策效应呈现于微观层面,甚至投影到个体层面,追踪政策的微观归宿,度量政策的最终效果。因此,本文结合典型案例,基于全国企业汇算清缴大数据及现行企业所得税税制结构和课征办法,应用大数据微观模拟方法,对我国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的执行效果进行研究,为税收政策的优化完善提供科学参考。

2 模型构建

企业所得税微观模拟模型的构建流程如图1所示。在理论逻辑和现实抽象分析(※符号表示的区间)的基础上,模型的构建流程包括数据处理(模块①)、数据时化(模块②)、税法计算器应用(模块③)、行为反应(模块④)和效应分析(模块⑤)五个模块。

2.1 数据处理模块

与基于抽样数据的传统微观模拟模型显著不同的是,文中核心数据来源于中国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数据,模型主体直接建立在该数据库的统计单元基础之上,通过直接计算全部申报企业的数据,精确反映全国税收和宏观经济的状况。为了进一步明确企业信息并测算企业行为,本文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基础上,尝试衍生了两个用于分析的数据库,包括企业基本信息库和企业申报信息库。企业基本信息库提供微观模拟对象的一户式信息,是实现政策筛选机制的重要基础,也是开展经济分析、社会效应分析的前提。企业申报信息库是核算企业所得税应纳税额的必要数据来源。

具体的数据处理包括以下环节。(1)年度申报数据清洗。对历年企业所得税年度申报数据进行清洗和预处理,包括缺失值处理、极值检验以及逻辑规则检验等。(2)构建微观数据库。以企业按年度申报的《企业基本信息表》为基础,建立企业基本信息库,确定每个微观决策单位的唯一关键索引,同时提供企业的属性特征。根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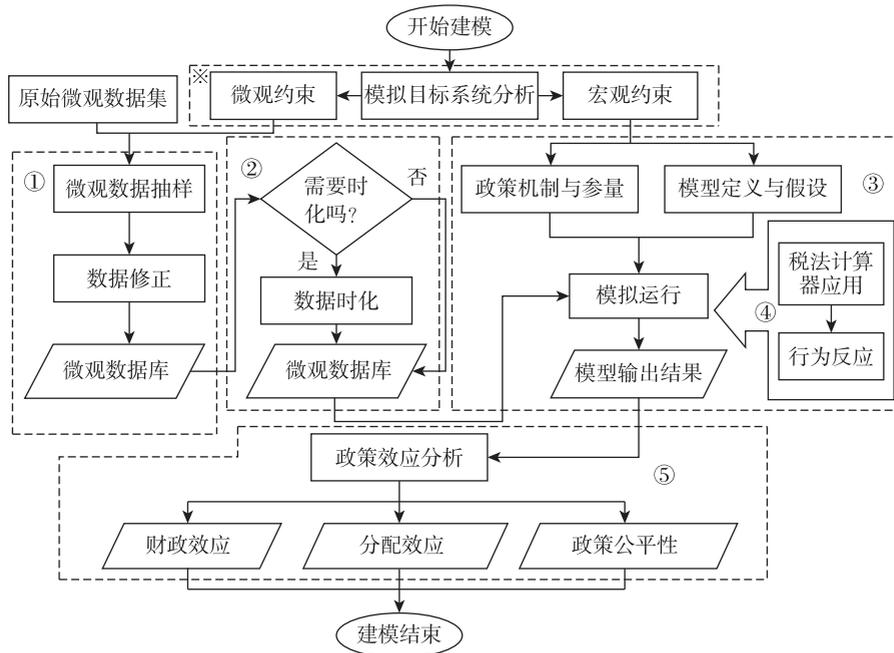


图1 企业所得税微观模拟模型的构建流程

政策整理结果，归集年度申报表中需要由企业填报的指标，按经营类、财务类、投资类等进行分类。(3) 建立模拟响应机制。根据税法规则，定义每个企业属性特征与税法模块中的筛选关系，定义每项申报指标与税法计算器各模块之间的核算关系，实现微观数据库与税法计算器的有效响应，确保模拟功能充分实现。

2.2 数据时化模块

引入数据的时化 (aging) 技术解决调查数据与目标数据之间存在偏离的问题。数据的时化一般是指对初始数据或者模拟数据进行重新加权和等级提升，进而实现数据特征变量值重置 (Merz, 1991)。数据的时化主要通过建立一个公共的外生调整因子，对微观数据进行分类加权，但是这种方法可能破坏微观数据的异质性，甚至引入不可控误差。文中涉及对未来信息进行预测的数据较少，因此数据的异质性特征可以尽可能得以体现。对于部分需要预测的数据，采用加权移动平均方法进行外推。公式如下：

$$Y_t = \sum_{i=1}^n w_{t-i} Y_{t-i} \tag{1}$$

其中， n 为移动平均的时期个数，该模型中取 3； w_{t-i} 为滞后 i 期数据权重，本文使用经验递减型加权，设置 w 的衰减因子为 0.618，则 w_{t-i} 最终分别取值 0.50、0.309 和 0.191。

2.3 税法计算器应用模块

税法计算器应用模块主要通过构建企业所得税的税法计算器,模拟税收政策对微观个体的作用。税法计算器包括以下内容。(1)利润模拟,根据企业的收入、成本、费用和收益等申报表指标,计算得到利润总额指标,并按一般企业、金融企业和事业单位的不同财务特点进行筛选区分。(2)应纳税所得税额模拟,依据企业所得税法对企业财务利润进行调整,经过纳税调整、境外纳税调整、减免收入和加计扣除优惠、所得优惠、抵扣所得额优惠、弥补亏损等子模块,得到应纳税所得税额。(3)应纳税额模拟,对企业应纳税所得税额按税法做进一步调整,计算得到企业最终的应纳税额,其中包括适用税率、所得减免调整、境外所得减免调整、预缴调整、应补(退)调整等子模块。

2.4 行为反应模块

对于企业投资和雇佣等行为,可以基于历史数据通过测算相关弹性获得不同收入水平下的企业行为特征。假定企业的投资和雇佣是收入的函数,企业的一系列行为反应均与收入相关。为了测算描述企业行为变动的弹性指标,需要以企业收入作为条件,估计企业的投资、雇佣等的条件分布。分布估计可以采用 Callaway 和 Huang (2018) 所提出的实证方法。

第一步,使用分布回归 (Foresi and Peracchi, 1995; Chernozhukov and Melly, 2013) 估计企业投资、雇佣等的条件分布函数。分布回归通过估计一系列以 $1\{Y \leq y\}$ 为被解释变量的二值响应模型实现:

$$F_{YT}(y|t) = E[1\{Y \leq y\} | T = t] = A[\alpha_1(y)t + \alpha_2(y)] \quad (2)$$

其中 Y 为企业投资、雇佣等行为; T 为企业收入; A 为连接函数,设定为 Logit 类型的连接函数; $\alpha_1(y)$ 和 $\alpha_2(y)$ 是随 y 变动的未知参数; $1\{Y \leq y\}$ 是指示函数,若 $Y \leq y$ 则等于 1,反之等于 0。条件分布 F_{YT} 估计量为:

$$\hat{F}_{YT}(y|t) = A[\hat{\alpha}_1(y)t + \hat{\alpha}_2(y)] \quad (3)$$

利用企业投资、雇佣等分布即真实分布 $F_{YT}(y|t)$ 可以对不同收入水平下的企业投资和雇佣水平进行测算,这些指标均构成企业收入的函数。传统研究通常利用企业投资或雇佣对企业收入进行回归,但是相关弹性通常为常数。但是由式 (3) 可以发现,企业投资和雇佣分布为条件分布,不同收入下的企业投资和雇佣水平并不相同,这意味着企业投资、雇佣和收入之间的关系属于局部测算,即不同收入水平下的企业的投资或雇佣均不相同。

第二步,利用企业的真实分布,可以计算得到任意收入分位数。令 $\tau \in (0,1)$, 则收入分位数为:

$$Q_{YT}(\tau|t) = \inf\{y: F_{YT}(y) \geq \tau\} \quad (4)$$

第三步，估算特定收入下的企业投资或雇佣水平均值：

$$E[Y|T=t] = \int_0^1 Q_{\text{IT}}(\tau|t) d\tau \quad (5)$$

第四步，估算企业收入变动后的投资、雇佣等行为的改变，即弹性。由企业投资或雇佣水平均值可以定量测算企业行为反应。令 δ 等于一个微小量，企业行为反应为：

$$LIGE(t) = \frac{E[Y|T=t+\delta] - E[Y|T=t]}{2\delta} \quad (6)$$

2.5 效应分析模块

政策即期归宿效应的实验分析是微观模拟技术的专属优势所在。文中主要研究内容包括以下几点。(1) 在静态假设下计算当前企业所得税改革的减税效果，以此作为直观判断和比较分析的基础。(2) 利用数据挖掘和匹配技术，测算当前企业所得税改革导致企业会计信息跃迁的概率，并通过企业会计统计信息，估计影响企业行为和营业状态变迁的因素及其贡献。(3) 利用微观经济模型，估计企业生产经营行为决策的量化影响因素，建立可以预测和模拟企业投资、研发、用工等各类经营决策的模型系统。(4) 在能够充分校准企业决策行为和经营状态的基础上，汇总微观数据，估算企业所得税改革的微观经济效应和宏观财政效应。

3 数据处理与参数设定

我国 2019 年的税收改革是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以后的最重要改革，也是对作为第二大税种的企业所得税进行的重大结构性调整。为更好体现企业所得税改革的政策效应，本文以 2019 年的企业所得税改革为例，应用总体实时大数据进行税收政策效应微观模拟研究。研究数据来源于中国企业所得税的汇算清缴数据，包含企业纳税信息以及其他基本信息。2019 年全国共有 2605 万家企业，其中国有企业 5.11 万家；民营企业 2259 万家，占整体企业数量的 86.72%；其他企业 340.89 万家。另外，小微企业 2151 万家，占整体企业的 82.57%。从产业分布来看，第一产业共 46.06 万家，第二产业共 900.66 万家，占企业整体的 34.57%，第三产业共 1658.27 万家，占企业整体的 63.66%（见表 1）。同时，为了获得更多企业行为数据，本文也参考了 2000 ~ 2013 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部分数据。文中选取数据的权威性较强，且是研究对象的总样本，不存在所谓的样本代表性问题。

对数据进行以下处理：(1) 剔除关键信息（税务、投资、盈利、员工人数）缺失的企业样本；(2) 剔除非正常经营的企业样本；(3) 为了防止极端值对结果的干扰，本文按企业资产规模分组，对各变量进行首尾 1% 的截尾处理；(4) 对中国工业企业数据进行 3 期的加权移动平均，推算相关数据。

表 1 税收数据分布情况

分类		数量 (万家)	占比 (%)
企业性质	国有企业	5.11	0.20
	民营企业	2259	86.72
	其他企业	340.89	13.08
企业规模	非小微企业	454	17.43
	小微企业	2151	82.57
产业类型	第一产业	46.06	1.77
	第二产业	900.66	34.57
	第三产业	1658.27	63.66
总计		2605	100

根据模型构建流程,首先在数据处理模块,利用加权移动平均方法进行数据推断时,设定不同的移动平均权重和移动平均期数。在数据时化模块,由于需要保持样本的异质性特征,因此采用3期加权平均时化相关指标[见式(1)],此处涉及加权移动平均的权重设定。在模拟过程中,设定不同的衰减因子和权重,观察模拟结果的差异。在行为反应模块,在估算弹性的过程中,由于采用蒙特卡洛方法进行局部估算,涉及两部分参数设定。弹性的局部估算需要划分若干条件变量(企业收入)的分位点,此处分别设定等距的20个分位点、15个分位点以及10个分位点进行弹性估算。式(6)中的 δ 属于一个微小量,分别设定0.0001、0.0005和0.001三个参数值。

4 政策模拟

4.1 政策模拟基准

综合来看,案例中企业所得税改革的重点包括以下几点。(1)固定资产加速折旧优惠行业范围扩大至全部制造业领域。(2)对于符合条件的集成电路与软件企业,第一年至第二年免征所得税,第三年至第五年按25%税率减半征收。(3)进一步放宽小型微利企业认定标准,引入超额累进计税方式;年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100万元的,减按25%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按20%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年应纳税所得额大于100万元但不超过300万元的,减按50%计税,按20%税率征税。(4)企业通过公益性组织以及政府部门及直属单位用于扶贫的捐赠支出允许税前扣除。(5)对符合条件的从事污染防治的第三方企业减按15%税率征税。

根据上述税收改革要点,构建中国企业所得税微观模拟模型,并对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进行量化评估。为使研究可行、结果一致,并且尽可能精准量化改革的实际效果,在相同的经济环境下进行改革前后政策体系的独立模拟实验,即在假定各类外生经济因素保持不变的条件下,计算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的净效应,并重点从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总体效应、分行业分地区的减税效果以及优惠政策的行为效应三个方面累

积输出模拟结果。

4.2 政策总体效应模拟分析

根据政策模拟结果,2019年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会使684.74万户企业^①直接受益,整体减税金额达2143.00亿元,户均减税3.13万元(见表2)。其中,国有企业并非本次减税降费的重点对象,直接享受税收优惠的户数最少,为3.10万户,占享受优惠企业总量的0.45%,但是国有企业减税规模较大,户均减税额达41.96万元,远超平均水平;民营企业是减税政策的靶向目标,也是最主要的受惠群体,有558.00万户民营企业享受了税收优惠,占全部受惠企业的81.49%,整体减税金额达到1570.49亿元。从细分企业来看,小微企业有464.67万户享受了优惠政策,减税金额达到1492.18亿元,户均减税额为3.21万元;高新技术企业享受此次税收优惠的数量有限,大约占全部受惠企业的0.89%,主要是由于大量高新技术企业已经获得了税收政策改革所带来的优惠,但高新技术企业在本次税改中整体减税规模为366.55亿元,户均减税规模高达60.09万元。总体上看,国有企业与高新技术企业享受优惠的企业数量较少,但是受惠力度最大,户均减税规模最大;小微企业与民营企业的受惠覆盖面最广,整体减税金额较高,但是由于基数较大以及规模较小,户均减税金额低于国有企业与高新技术企业。

表2 享受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的企业减免额情况

企业类型	享受优惠企业数量(万户)	企业数量占比(%)	减免税额(亿元)	户均减免税额(万元)
国有企业	3.10	0.45	130.08	41.96
民营企业	558.00	81.49	1570.49	2.81
其他企业	123.64	18.06	442.28	3.58
小微企业	464.67	67.86	1492.18	3.21
高新技术企业	6.10	0.89	366.55	60.09
合计	684.74	100.00	2143.00	3.13

数据来源:根据微观模拟模型计算得出。

4.3 政策归宿效应模拟分析

为细化此次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的微观归宿,以分产业和分地区的方式进一步进行结构拆分。如表3所示,在产业层面,第一产业享受此次税收优惠的企业数量较少,只有9.47万户,占全部受惠企业的1.38%,整体减免税额为8.82亿元,户均减税额为0.93万元,远低于整体平均水平。第二产业有247.78万户企业享受了此次税收优惠,占整体的36.19%,减税金额为1098.31亿元,户均减税额为三大产业中最高,达到4.43万元。第二产业中最主要的受惠企业为制造业企业,占全部受惠企业的

^① 仅为受到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影响的企业,因为大量处于亏损状态的中小型企业无法在当期从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中直接受益。

24.05%，户均减税额达到4.95万元。第三产业的受惠面最广，有427.48万户，占全部受惠企业的62.43%，整体减税规模为1035.87亿元，户均减税规模为2.42万元。在第三产业中，批发和零售行业受惠情况最为突出，有225.35万户企业受益，占全部受惠企业的32.91%。总体来看，第一产业的受惠面最小，享受的优惠力度也最小，主要是由于我国前期对于符合条件的从事农、林、牧、渔业的企业已经普遍实行免征、减征企业所得税的优惠措施，此次税收优惠不再重复覆盖；第三产业的受益范围最广，占整体受益企业的62.43%；第二产业的减税力度最大，户均减税额较高，而制造业成为税收优惠的重点对象。

表3 享受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的企业减免额情况（分产业）

行业分类	享受优惠企业数量 (万户)	企业数量占比 (%)	减免税额 (亿元)	户均减免税额 (万元)
第一产业	9.47	1.38	8.82	0.93
第二产业	247.78	36.19	1098.31	4.43
其中：制造业	164.69	24.05	814.69	4.95
第三产业	427.48	62.43	1035.87	2.42
其中：批发和零售	225.35	32.91	517.29	2.29
租赁和商务服务	64.02	9.35	149.40	2.33
合计	684.74	100.00	2143.00	3.13

数据来源：根据微观模拟模型计算得出。

如表4所示，在地区层面，东部地区企业集中，享受优惠企业户数也最高，有417.65万户，占全部受惠企业的60.99%，减税额为1062.93亿元，户均减税2.55万元，低于平均水平。中部地区享受优惠企业户数为112.76万户，减免税额411.33亿元，户均减税3.65万元，高于东部地区。西部地区享受优惠企业户数为128.00万户，减税规模为576.17亿元，户均减税额最高，达到4.50万元。东北地区享受优惠企业有26.33万户，户均减税额为3.52万元，高于平均水平。总体而言，从减税涉及的企业数量来看，东部地区最多，西部地区次之，东北地区最少；而从平均减税规模来看，西部地区最大，中部地区次之，东部地区最小。

表4 享受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的企业减免额情况（分地区）

地区分类	享受优惠企业数量 (万户)	企业数量占比 (%)	减免税额 (亿元)	户均减免税额 (万元)
东部地区	417.65	60.99	1062.93	2.55
中部地区	112.76	16.47	411.33	3.65
西部地区	128.00	18.69	576.17	4.50
东北地区	26.33	3.85	92.57	3.52
合计	684.74	100.00	2143.00	3.13

数据来源：根据微观模拟模型计算得出。

4.4 政策行为效应模拟分析

企业盈利能力增强。根据政策模拟结果,企业所得税普惠性与结构性优惠政策,极大地提高了企业的盈利能力,盈利企业占比由原本的18.01%提高到了23.14%,提高了5.13个百分点。所得税优惠政策通过税率、税额等多个方面作用最终减少企业的所得税费用,直接降低了企业的真实成本,将政策利好充分体现在企业可支配收入上,在增强企业扩大再生产能力的同时,有利于企业不断增强自身优势,提升市场竞争能力。

企业投资能力增强。根据政策模拟结果,从新增(或维系)企业数量、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和研发投入等方面的综合效应来看,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将间接稳定和拉动企业投资的规模为857.2亿元,约占全年国内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增量的3.5%。税收政策改革,可以在通过减税降费降低企业纳税负担的同时缓解企业的资金压力,企业投资活动可能被更好地激活。此外,企业投资的高风险与收益不确定性会产生很高的沉没成本,税收政策改革可能弥补企业的投资损失,增强企业的稳定性。

企业吸纳能力增强。根据政策模拟结果,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在当年增加就业54.28万人,同时稳定现有就业规模136.92万人。减税降费政策促使企业税收负担大幅度下降,企业经营成本下降,经营资金更加充沛,应对外部市场风险的能力增强,从而稳定就业。同时,减税降费政策也吸引更多的社会投资用于成立企业,形成新的劳动力需求,从而扩大了就业规模。

结论与建议

在公共政策科学性与精准性日益增强的背景下,使用微观模拟技术对政策进行评估是提高政策精细化水平的必要环节,也是政策制定和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关键要素。本文以2019年税收改革为例,应用大数据微观模拟方法,对中国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的执行效果进行研究。

研究表明,企业直接性税负的降低将显著改善企业经济状况,提高企业盈利能力和盈利企业占比,拉动全年国内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增加,提高企业劳动力需求,同时降低企业破产风险;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企业的减税规模和覆盖群体大于和多于第一产业企业;民营企业受惠覆盖面最广,小微企业是其中的最主要群体,高新技术企业享受税收优惠的力度最大;东部地区涉及的优惠企业数量最多,西部地区的减税力度最大。总体上,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为优化我国经济结构和稳定社会发展提供了助力,对于促进我国企业发展、拉动经济增长、稳定社会就业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实际作用效果与政策目标基本吻合。

根据研究结论提出以下建议。

首先,持续深化企业所得税改革。以减税降费为目标,以降低(边际)税率为主要手段,适度推进结构性调整,保持政策性税基稳定,最终通过经济增长逐步扩大税

基,提高税负份额。

其次,适度引导企业的税收政策行为反应。由于减免优惠和加计扣除等原因,我国企业所得税事实上具有超额累进功能。企业所得税改革应更加关注政策设置的间接经济效应和微观行为导向,适当地从特殊企业减免优惠的政策导向逐步转向普遍性减税降费的政策导向。

最后,强化企业所得税改革中的政策关联性和协同性。企业所得税政策评价和设计需兼顾结构性改革措施之间的联动、改革措施与既有政策之间的协同、国内政策体系与外国政策体系和国际规则之间的协调。促进减税降费规模与企业政策感知之间的耦合性,最大限度地避免出现税务系统改革造成的结构性错配。

参考文献

- 郭雷,戴汝为,陈翰馥.2004.系统、控制与复杂性科学 [R].香山科学会议——第227次学术研讨会,北京.
- 郭绍禧.1986.一种有广泛应用前途的经济数学模型 [N].光明日报,05-28(4).
- 李善同.1990.微观分析模拟模型 [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6):64-68.
- 刘磊,魏志梅,周华伟,付瑜.2010.完善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问题研究报告 [J].税务研究,(2):53-58.
- 罗红云,邹伟轩,周立楠.2023.新一轮个税改革的收入再分配综合效应研究——基于CFPS微观调查数据的模拟测算 [J].新疆财经大学学报,(1):50-63.
- 万相昱,安达,王亚强等.2021.新冠疫情背景下减税降费政策对小微企业影响研究——基于微观模拟的测算分析 [J].价格理论与实践,(1):27-33.
- 万相昱,蔡跃洲.2019.以综合集成方法论突破社会科学认知局限 [N].中国社会科学报,12-10(7).
- 万相昱,唐亮.2017.转轨经济条件下负所得税制度的实证研究——基于主体的微观模拟途径 [J].数量经济研究,8(2):29-37.
- 万相昱.2009.我国城镇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改革的微观模拟——基于劳动供给反应的政策效应研究 [J].公共管理学报,6(4):52-60+126.
- 万相昱.2011.个人所得税改革的灵敏度分析:基于微观模拟途径 [J].世界经济,34(1):93-106.
- 王道树.2007.企业所得税收入归属机制研究 [J].财贸经济,(4):10-17+128.
- 叶显,吴非,刘诗源.2019.企业减税的创新驱动效应研究——异质性特征、机制路径与政府激励结构破解 [J].现代财经(天津财经大学学报),39(4):33-50.
- 张岩.2019.结构性减税与扩张政府支出的宏观经济效应 [J].经济与管理研究,40(9):20-38.
- 朱启荣,姚敏,杜才平.2018.中国降低企业税负的经济效应——基于GTAP模型的评估 [J].经济学家,(5):69-78.
- Caiumi, A., Biagio, L. D. 2015. Corporate effective taxation in Italy using a new microsimulation model (ISTAT-MATIS) [R]. ISTAT Working Papers.
- Callaway, B., Huang, W. 2018. Intergenerational income mobility: Counterfactual distributions with a continuous treatment [R].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Temple University.

-
- Chernozhukov, V. , Melly, B. 2013. Inference on counterfactual distribution [J]. *Econometrica*, 81 (6): 2205 – 2268.
- Devereux, M. P. , Loretz, S. 2008. The effects of EU formula apportionment on corporate tax revenues [J]. *Fiscal Studies*, 29 (1): 1 – 33.
- Finke, K. , Heckemeyer, J. H. , Reister, T. , et al. 2013. Impact of tax-rate cut cum base-broadening reforms on heterogeneous firms: Learning from the German tax reform of 2008 [J]. *FinanzArchiv: Public Finance Analysis*, 69 (1): 72 – 114.
- Foresi, S. , Peracchi, F. 1995. The conditional distribution of excess returns: An empirical analysis [J]. *Publications of the American Statistical Association*, 90: 451 – 466.
- Gupta, A. , Kapur, V. 2000. *Microsimulation in government policy and forecasting* [C]. Elsevier Science.
- Merz, J. 1991. Microsimulation: A survey of principles, developments and applications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Forecasting*, 7 (1): 77 – 104.
- Orcutt, G. 1957. A new type of social-economic system [J].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39 (2): 773 – 797.